

主编 束定芳 副主编 张逸岗

外语教育往事谈

——外语名家与外语学习

第二辑



W
外教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主编 束定芳 副主编 张逸岗

外语教育往事谈

第二辑



——外语名家与外语学习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语教育往事谈. 第二辑: 外语名家与外语学习/ 束定芳主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ISBN 7-81095-314-1

I. 外… II. 束… III. 外语教学—文集
IV. H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00099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刘 犁

印 刷: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32千字

版 次: 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100册

书 号: ISBN 7-81095-314-1 / G · 204

定 价: 15.00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序

作为一个外语老教师,我常常碰到一些提问者。提得最多的是两个问题:(1)学外语,最好的方法是什么?(2)国内有许许多多的外语专家,他们学外语,用的是什么方法?

显而易见,这两个问题是很难回答得圆满的;多年以来,它像一根绳子,把我捆得喘不过气来。现在好了,束定芳先生把我解放出来了。他的办法是编一本国内外语专家们的论文集,执笔者共有二十多人。读了这些人的文章,我觉得他们各抒己见,异彩纷呈。

从内容看,这些文章谈的是下面这些:(1)外语学习的经验;(2)外语教学的经验;(3)办外语专业和进行改革的经验;(4)在今天的形势下,如何对付新的挑战?我相信,外语界无论是谁,读了这些文章,都会眼界大开,心潮起伏。

除约我写论文集序文之外,束定芳先生还要我谈谈自己学外语、教外语的经历和甘苦。命令已经发出,我不敢不从。现在就把一篇自述附在后面,敬请读者们批评指正。

王宗炎

2004年1月10日

编者的话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总体而言,我国外语教育理论研究还很薄弱,外语教学实践中还存在许多很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近年来,要求外语教改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外语教改究竟应该如何进行,重点应该在哪里,争议还很多。教育界、外语界部分崇洋媚外的人士谈及外语教学,言必称“国外”,对国内的一些经验性的理论研究,对传统外语教学中的一些做法往往不屑一顾,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殊不知,国外的很多语言教学理论是针对“第二语言学习”的,许多建议和做法并不完全适合我们学习外语的环境。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好的理论,但一定要结合我们中国的实际。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就必须下工夫去真正了解中国人是如何学外语的。只有通过成功外语学习者的成功经验的调查与分析,通过吸取中国传统外语教学中一些合理的方法,才能真正找到适合中国人学习外语的方法,找到教中国人学好外语的“捷径”。

1988年,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编辑部李良佑和刘犁先生合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一书收录了季羨林、许国璋、王佐良、陈嘉、范存忠、方重等我国外语界老一辈知名专家学者撰写的有关回顾自己外语学习和教学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既是成功的外语学习者和外语教师,又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大师,他们学习和教授外语的成功经验,以及对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外语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发表的真知灼见,是我们研究中国外语教学理论的宝贵财富。老一辈外语专家们对祖国外语教育事业热爱的拳拳之心,

跃然纸上。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广大外语教师和外语学习者的热烈欢迎,在我国外语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我国外语教育史和外语教学理论研究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

弹指一挥间,十五年过去了。当年《外语教育往事谈》的许多作者已经离开了我们,而当年怀着敬畏的心情阅读此书并从中获得启发和教益的我国外语界的一些中年学者,如今也大都成了我国外语界令人仰慕的知名专家和学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一方面成功的外语学习者和杰出的外语教师,另一方面由于长期担任高校外语院系的领导工作,经历了或参与过我国外语教学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和变化,他们对自己学外语和教外语经历的回忆、对我国几十年来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的评述、对当前外语教改中热点问题的点评,都将是我們研究中国外语教学历史、探讨中国外语教学理论的宝贵的财富。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从2002年初起,我们就着手准备编辑出版一本《外语教育往事谈》的续编,约请我国外语界和语言学界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撰写专文,回顾自己早年外语学习和教学过程中最值得回忆和最有效的方法,并就我国外语教学改革的有关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近两年来,我们陆续收到了我国外语界许多有影响的语言学家和外语教学专家的来稿,部分文章已在《外国语》和《外语界》杂志上摘要刊登。

本集子中的文章排序我们仍沿用了《外语教育往事谈》的办法:按年龄顺序。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尊老传统的一个体现。

由于时间仓促和联系不便的关系,我们未能联系到更多的专家为我们写稿。我们希望再过几年,能约请到更多的知名专家和学者,特别是正当壮年的外语界中流砥柱们,为我们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理论体系而共同出谋划策、描绘蓝图。

编者

2004年2月8日

目 录

求学休停步 耕耘不计年·····	王宗炎	(1)
也谈我国外语教改问题·····	章振邦	(8)
我的英语学习和教学·····	李观仪	(19)
我国英语教学应始终以读写为本·····	董亚芬	(29)
学习外语的漫长道路·····	赵世开	(39)
人世形势下的外语教改·····	程雨民	(50)
英语学习:回忆与感想·····	刘炳善	(55)
外语学习与语言学学习·····	戚雨村	(68)
外语学习的意义和我学习外语的历程与体会·····	伍铁平	(77)
外语学习和教学往事谈·····	胡明扬	(94)
我的双语教育·····	桂诗春	(109)
回忆我学习英语的过程·····	孙 驷	(118)
外语教学漫议·····	王德春	(137)
一个英语教师的独白·····	胡壮麟	(144)
采英撷华五十载 ——我的英语学习和教学经历·····	胡文仲	(162)
学习英语的点滴回忆·····	陶 洁	(174)
英语学习漫谈·····	杨惠中	(185)
外语是学会的·····	何自然	(191)
往者虽旧 余味仍新·····	徐盛桓	(202)
漫长的学习道路·····	刘润清	(214)
多读多写 ——英语学习谈·····	黄源深	(229)

风雨沧桑四十年		
——英语教学往事谈·····	戴炜栋	(238)
外文系怎么办? ·····	徐烈炯	(246)
勤则不匮·····	陆谷孙	(259)
不解之缘 苦斗人生·····	秦秀白	(264)
办好英语专业之我见·····	何兆熊	(273)

求学休停步 耕耘不计年

王宗炎

作者简介

王宗炎，1913年出生。193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英文系本科。历任广州外国语学院及中山大学副教授、教授，1986年起任博士生导师。1995年获得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已出版的著作有：(1)《回春楼谈英语》，(2)《语言问题探索》，(3)《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4)《汉英语文研究纵横谈》，(5)《语言学和应用》。

我是广西合浦县人，1913年生，193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英文系本科，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曾任公务员、报馆编辑、海关关员。后来转入教育界，先后任中学教师(1944—1946)、中山大学讲师、副教授(1946—1970)，广州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教授(1970—1978)，中间曾兼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特约通讯员(1944—1953)。后来任中山大学外语学院教授(1979年起)、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现代语言学丛书》主编(1983年起)、湖南教育出版社《外语与外国文化丛书》主编(1993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实用技能教程丛书》主编(1997年起)。我是中国语言学会第一、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1992年，我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有关证书；1995年获得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我这一辈子教过不少学生，帮助别人编过不少书，自己也有五

本著作。因为我长期教外语,我所研究的是:(1)汉语和汉语学习,(2)英语和英语学习,(3)外语教学法,(4)外语教学与外国文化,(5)语言学。

在大学生时代,我听过闻宥、容肇祖、W. J. B. Flercher 的课;大学毕业后,在学术研究方面我获得王力、吕叔湘、许国璋的帮助,在工作方面获得张沛霖、董秋斯、岑麒祥、周其勋、冯乃超的帮助。对于上述诸位先生,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个信条

一半出于天性,一半由于受到中外学者的启迪,我有三个信条。随着工作的进展,这些信条越来越明确了。

第一,我不认为什么人已经掌握了最后的真理,也不相信语言学界有个最高的权威;

第二,我认为学术研究总是后来居上,因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后人自然爬得更高;

第三,我相信,只有经过观察、实验、探索、讨论,才能逐步逼近和认清事物的真相。

根据这些信条,我主张学术界同人打开窗户,独立思考,仔细验证,自由讨论。我觉得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要有度量,要能容许不同的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在事实弄清之前,不必匆忙做结论。我还相信,过去的定论其实也不过是已经获得公认的假说,今后还要不断验证。

五十多年来,我所干的是教学工作、编辑工作和著述工作,下文将按这个次序谈谈。我觉得自己兴趣广泛,但钻研不深;用功很勤,但成果不大。

教学工作

我自1944年开始从事教学。一当上教师,我就觉得这是最可喜的行业,终身不改。

为什么我喜欢教学工作呢？这有几个原因。一是工作方法可以自由选择，不受别人控制；二是内容可以经常变换，不要天天念同一本经；三是学生对老师不断反馈，看见他们不断进步，自己觉得没有枉费功夫。无可否认，我也有自大感和虚荣心，由于这些东西作怪，所以教学工作尽管十分繁重，我还是乐此不疲。

我开过英语专业本科高年级的精读课和翻译课，也开过研究生的普通语言学课和语言史课。这些课在当时颇有好评，但多年后回想起来，缺点是显著的。

50至60年代，我主要教英语精读课，教材是别人编的。我的办法是老办法，每课先讲全文内容，特别着重政治意识问题（这是当时的风气），进而阐发词汇要点和语法要点。我教翻译课不用别人编的教材，只让学生翻译一些短文，再加以修改和讲评。我赞成瞿秋白的翻译理论，但对鲁迅的译文不敢恭维。

如果说我的教学效果不好，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几十年后还有学生对我说（并且对人说），他们自己从听课得到了益处。他们认为我的作风严格认真，让他们受到了熏陶。

但是，如果仅仅因为得到学生的一些好感，便自满自足起来，那是可笑的。我没有受过师范教育，在教学上必然犯了不少错误。

回想起来，我的教学方法的主要缺点是：（1）虽然不照本宣科，能给学生提供一些有用材料，可是在课堂上只唱独角戏，没有跟学生讨论磋商。（2）在讲课时，我只管灌输，不重启发。课前我没有要求学生某些问题加以考虑，课后也不要求他们再深入思考。（3）我学过语言学，知道外国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重视口语，可是在教学时我偏重书面语，根本没有安排什么口头练习，没有把读写与听说结合起来。

我的主要毛病何在呢？在于对教学过程没有正确而全面的认识。我只重教，不重学；只重传授，不重引发。在我当时的心目中，老师是示范者和指挥者，学生是模仿者和顺从者。我没有看到，这正是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窠臼。

编辑工作

从80年代初期起,我除当教师外,还当上编辑。最初以教学为主,后来喧宾夺主,编辑工作竟比教学工作还要吃重。不过,从社会效益看,也许编辑工作比教学的用处多一点。

1981年,各地语言学者在广州开会,决定要编印一套《现代语言学丛书》交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编委会由许国璋和我任主编。20年来,这套丛书在语言学界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先后面世的有关于普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的书。由于著作者们的努力,中国人第一次能从本国著作中看到一些先前只能从外国著作中才能找到的语言学理论和材料。最近出版的两本语用学专著,除引进外国理论外,还把这些理论试用于汉语研究,那就更进一步了。

1983—1986年,北京出版界决定编印《中国大百科全书》,其中《语言文字》卷的“语言学”、“世界诸语言”两个分支的编写组由许国璋任主编,我和黄长著任副主编,周流溪任组员。许先生把试写“语言学”条的任务交给我,我花了半年功夫才完成,并请十位同志审议。这个分支的其他稿件是分请专人撰写的,但都由我从头到尾加以审订,这是一件吃力而有意义的工作。

80年代后期,国内有些学者觉得,教外国语而不讲相关的民族文化,是无法讲得透的。我参考了胡文仲和别的一些同志的意见,建议湖南教育出版社编印一套《外国语与外国文化丛书》。除写总序外,我还与出版社商量,聘定五个语种的书稿撰写人。这套丛书国内从来不曾有过,我们干的是破天荒的工作,是关于英国英语与英国文化、美国英语与美国文化,现在已出了书,别的书也将陆续付印。我这个“负弩前驱”的老兵可聊以自慰了。

90年代,由于同事和朋友们的怂恿,我先后为十来人审改书稿。这其中有李筱菊教授谈语言测试、何广铿教授谈英语教学法、朱道敏教授谈口译、林汝昌教授谈语义学等等的专著。我尽了薄

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改进内容或文字,同时也从他们的书稿中吸收了不少自己缺乏的资料和知识。

最近我们中山大学的英语教师们为北京大学出版社编一套书,名为《实用技能教程丛书》,我又被推为主编,辞也辞不掉。我们的宗旨是参考当代国外语言理论和教学理论并根据中国学生的实际需要,编出一系列材料新鲜、切合实用的教材来。

第一种书名为《英语交际口语教程》,已经出版。在编写前,我们对大学毕业生的工作需要进行过调查,并从大量书报中挑选有用资料,附带着也讲述了有关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第二种是《现代信息英语翻译教程》,其中有许许多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商贸、医药、卫生的资料,都是从最新报刊中选出的。我们采取一种新编法:先就一篇文章的内容提问,然后选择某些段落。我们认为,要内容与技巧并重、示范与创新并重。这些做法,在我们还是破题儿第一遭。

十年前,我与许国璋先生谈过编辑工作问题。我问他,“编北外学报,你花了多少功夫?”他笑一笑说,“I put my heart and soul into it.”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当编辑,这不是把别人稿件过过目那么轻松的一回事。我非但要字斟句酌,有时还要与各位作者商量、讨论,甚至进行持久的争辩。

著述工作

我是一个外语教师,无论读书、观察、做实验、思考研究,都是为了教好书。我的治学宗旨平平无奇:学以致用,言必有据,不能证明的理论,我不能接受;无实用的学说,我留待别人去钻研。我这个倾向,要是寻根究底,可能与顾亭林的思想有关。

我一辈子只写了五本书,都不是什么惊人之作,却受到了某些读者的欢迎。这可能是由于“下里巴人”比高雅的曲调更合乎流俗的品味吧?

1958年,我国进入了“大跃进”时期。中山大学外语系那时也

要大跃进,教师们奋勇地编出了《英语自学丛书》。我除要几位同事审稿外,自己还要编一本《英语语法入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了顺应当时的风气,我把英国 J. C. Nesfield 的语法书和前苏联 Ganshina 的教材捏合在一起,删繁就简,例子也力求有“思想性”。出乎意想之外,出版之后一印再印,竟售出了 20 万册以上。

第二本书是《回春楼谈英语》,1983 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论文集中,我初步总结了自己的翻译经验,追溯了中国学生英语作文出错的根源,又介绍了当时很负盛名的《美国传统词典》。我还做了一件大胆的事:对英国 Randolph Quirk 等合编的 *A Contemporary Grammar of English* (1975) 的某些论点提出了质问。竟想不到,上海有些学者居然认为我确有所见。

1988 年第三本书是《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有一部分是在医院编成的,那时我面对着两个敌人——一个是知识有限,一个是身体欠佳。这书是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计划的一个项目,1995 年获得了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消息传来,我觉得惭感交萦。

在编写这本词典时,我以 *Longman Dictionary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85) 为蓝本,加以改写和增订。在取材范围、立条标准方面,大致仿照原书,但在学术观点、术语定义、例证选择方面,我们自有主张,并非跟着 Longman 亦步亦趋。书中的缺点已由胡壮麟教授指出,但许国璋教授的书评却给了我们难得的夸奖。

第四本书也是论文集,名为《汉英语文研究纵横谈》,1997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在书中讨论三类问题:语言学研究、汉语语言学和英语语言学研究。我不改故态,依然独往独来。我说 Chomsky 驳倒了 Skinner 的行为主义语言理论,但是他自己那套语法天生说可是无稽之谈;我指出 Halliday《汉语语法范畴》一文中汉语例子的纰漏,但关于汉语“语法词”和“词汇词”的区别,我可支持 Halliday 的主张。

我的第五本书还是论文集,名为《语言学 and 语言的应用》,1998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书所讨论的问题是:(1)语言教学问题;(2)翻译问题;(3)辞书问题。关于语言教学,我不赞成专讲语言结构,也不赞成偏重语言功能。关于翻译,我认为译者必须先从历史、文化、社会背景摸索出原文的真正意义来,不然译文便难免失去原文的神韵。我挑出了1987年以来国内出版的多种新辞书加以检查,并惊喜地发现,编者已经打破了过去的思想枷锁,在三方面取得了进展:(1)在叙述历史事件时,能采取客观的态度。(2)在谈生理心理现象时,能以科学实验为根据。(3)在谈学术思想时,能把不同意见搜集在一起,原原本本地端出来。一句话,我们的辞书界已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前进,神学观点和教条主义再也无立足之地了。

回顾和展望

回顾50多年来的工作,我能说些什么呢?

我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得到了难得的指引和提携。

我觉得自己虽然老了,可还要也还能继续学习,继续写作。

我牢记古人的名言:“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烛光自然比不上阳光那么明亮,但我还要勇敢地跟着它前进,前进,再前进。

也谈我国外语教改问题

章振邦

作者简介

章振邦，1918年生，安徽合肥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长期从事高校英语教学和教材改革工作。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与上外英语系部分教师一起从事英语语法编写体系的改革工作。首次在我国英语语法书中引进了“两时两体”的动词系，贯彻了“层次分析法”，确立了“限定词”为一词类，并根据“洋为中用”、“删繁就简”的原则，兼收并蓄当代不同语法流派之所长，改革了传统语法书中某些过时的、不利于我国英语教育的部分，从而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个新颖的英语教学语法编写体系。根据这一体系主编的《新编英语语法》于1986年获“上海市1979—1985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根据同一体系主编的《新编英语语法教程》于1990年获“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首届优秀图书一等奖”，于1998年获“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根据同一体系编写的《新编英语语法概要》、《通用英语语法》等也都受到不同层次的英语学习者的欢迎。

我1944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主要从事高校英语教学工作。1956年奉调来到上海外国语学院，一干就是40多年。在这40多年中，除“文革”中一度靠边站外，一直参与上外英语系的教改工作，深知其中的复杂性。自1987年离休至今，虽仍笔耕不辍，但毕竟脱离教学第一线多年，对目前许多实际情况不甚了了，所以我今天来谈英语教改问题只得从自己的亲身感受说起。

我 1918 年生于北京,从六岁起在家里读了六年私塾,背了一些古书,同时也跟英文教师学英语。当时父亲在北京铁路上工作,从清末到民初干了二三十年。那时铁路上许多官员都是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事无大小给上司写报告都得用英文,而家父不懂英文,只得花钱请人代笔,深以不懂英文为苦。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请人给我教英文,那当然仅是最起码的英文,然而有了那点英文底子,以后学英文就顺利多了。

我的英语学习在初中阶段取得很大的进步。当时学校聘请了一位名叫孔宪书的英文老师,他是清华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书认真,对学生非常严格。当时用的是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这部教材我认为是当时编得最好的,也是我从中学得益最大的中学英语读本,它有以下几个优点给我印象最深:一是语言材料丰富,每篇课文能保证一定的长度,语言地道、生动活泼,有个读头,也有个教头,不像现在有些中学课本,语言材料单薄,写得不生动,干巴巴的,课文像豆腐干似的,读来乏味。二是课文内容贴近生活,容易读,容易懂,容易上口,学了就能用。三是趣味性,书中编入了一些脍炙人口的神话故事,这些故事多为英国文学中常见典故的来源,经林先生用生动的当代英语一改写便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读来兴味油然。四是科学性,林语堂编写的这部中学英语读本时注意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对课文中语言点的处理比较细致,虽没有系统地讲语法,但对一些重要的语法现象还是结合着课文点到了。孔老师在上课时对书上的这些语法现象补充例句加以发挥,结合着讲解课文,一点一滴地教了文法。到了初中三年级我们已经学到不少语法知识,我自然而然就去归纳、综合这些知识,从而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粗线条的却又清晰的语法概念。这点语法知识对我日后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帮助很大。

早在初中二、三年级,孔老师就引导我们在课外阅读一些浅易的童话故事,如安徒生、格林的作品,既提高了我们学习英语的兴趣,又巩固了课内的英语习得。到了高中阶段,课外阅读的范围扩